

一個必須解開的心結

● 顧則徐

一個結，一個頑固的結，深刻地拘禁着當代中國的心跳。事實上，從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那一天起，一個深刻的心結就伴生了，這個心結就是姓社姓資。無論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還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都不過是試圖應對姓社姓資心結的初始方案，是政權建立初期的權宜，理想主義熱情進一步推動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追求純粹道路，試圖用純粹的社會主義消除姓社姓資心結。但困境依然存在，比如，貨幣並不能消滅，私有生活資料並不能掃蕩乾淨，國際貿易還是必須遵循國際資本主義商業規則，等等。更大的困境在於，一次次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運動愈來愈陷於精疲力盡的狀態，最終，不得不走上改革道路。在中國，當70年代末決定改革後，姓社姓資心結即強烈地糾纏起來，鄧小平用他包括「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四個堅持」作了威權定調，但問題並沒有解決，90年代初鄧小平乾脆提出「不爭論」，以平息紛爭。

但紛爭並不因為鄧小平的威權而真正平息。實際上，鄧小平的「不爭論」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的不爭論，是以威權手段對「姓社姓資」問題作結論，以暫時求得進行改革的空間，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姓

社姓資心結並不會因為一個「不爭論」而解開。最近《物權法(草案)》的被擱置，便是由姓社姓資心結導致的典型事件。《物權法(草案)》於2005年6月26日至7月1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進行了第三次審議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進行全文公布，徵求社會意見。2006年1月，媒體披露《物權法(草案)》被擱置。又經媒體進一步披露，導致《物權法(草案)》被擱置與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有關。鞏獻田教授指責草案說：「它最明顯的就是照抄照搬西方的法律，原來社會主義的東西基本上沒有。」(《法律與生活》，2006年2月9日報導)但《物權法(草案)》第一條就明確：「為明確物的歸屬，保護權利人的物權，充分發揮物的效用，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制定本法。」這宗旨是從西方抄不來的。也就是說，在姓社姓資心結的糾纏下，即使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也依然會被一些人判斷為是屬於資本主義的。這一心結不解開，中國的改革就不可能得到良性深化。

我無意批評鞏獻田教授，也無意批評《物權法(草案)》是否完善，只想由此指出姓社姓資心結對中國改革的干擾。試圖解開這一心結，就必須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這一範疇，而這在中

國是個世紀難題。朱德是毛澤東時代中國主要領導人中保持清醒頭腦的一個，他在逝世前不久的1976年5月，特意到《共產黨宣言》譯者成仿吾家，對成仿吾說：「現在有些問題討論來討論去，總是要請教馬克思、恩格斯，總得看《宣言》是如何講的。」(吳少京：〈朱德與成仿吾的夕陽情〉，《人民日報》，1996年12月2日)但是，《共產黨宣言》就能解決現代社會主義問題嗎？事實上，社會主義是涉及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運動，其基本傾向是強調人們進行生活的共同性，但有其複雜的演變史，在不同的地區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在理論上幾乎難以以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因此，當《物權法(草案)》起草人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時，鞏獻田教授又可以認為不是社會主義的。其實，他們雖然使用同樣的語詞，但並沒有站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

根據社會主義運動實際的演變史，而不是按照某種政治教條或「科學社會主義」教條，理解社會主義這個範疇就不能予以一概而論。就基本的事實講，應該分清國家、政權、社會、制度的差別，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制度既可能是四位一體的，也可能是不相一致的，是非一體化的。是否達到一體化，或達到甚麼程度的一體化，並不決定於某種思想，而是決定於一定的歷史進程。

國家是具有一定疆域、人口並有一個政府進行代表和管理的社會實體。一個國家的存在既可能是被其他國家承認的，也可能是不被承認的，因此，一個國家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決定於其他國家的認可，而是決定於自己的命名和對社會主義的價值判斷。從這個角度說，不僅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命名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利比亞、斯里

蘭卡等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因為對社會主義理解的不同而否認利比亞、斯里蘭卡等是社會主義國家。一般認為，只有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認識是把國家與政權的關係合二為一了。國家是該國人民在其中生活的共同體，因此，它具有相對穩定性，而政權則是控制這個國家的權利方式，雖然一個政權可以為自己建立一個國家，但一個國家可以有不同的政權更迭，也即政權較之國家具有相對不穩定性。中國在國家命名上並沒有明確為社會主義，但政權是由主張社會主義的政治集團所締造並全面控制的，正是通過締造並全面控制，才保證了國家政權單一的社會主義性質，這就是鄧小平等人反覆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深層原因。較之政權，政府可以有屆的更替，因此，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可能，即當政權並不是單一的社會主義性質時，在現代民主條件下，社會主義政黨可能通過選舉獲得執政機會，就像在歐洲國家經常發生社會主義政黨比如社會民主黨獲得一屆或數屆的執政權利那樣，但是，這種執政並不能把國家政權改造為單一性質的社會主義政權。

社會是人們進行生活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擁有複雜的實體形式，國家只是這些實體形式中的一種。作為國家的社會實體可以稱為國家社會。社會實體的社會主義屬性體現為這個實體中的人們進行共同生活的狀態，這種狀態趨向於人們進行生活的共同性，弱化人們共同生活的私人性，比如，1820年代末歐文(Robert Owen)的「新協和村」實驗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國家社會的社會主義屬性同樣也要從人們進行共同生活的狀態進行判斷，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一個國家的人們共同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四個方面，進一步，

就是規定在一個國家的規範人們共同生活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制度中。正是在這些具體制度中，社會主義屬性超越了政權形式，在現代世界獲得了廣泛實現，即，社會主義並不為具有社會主義政權和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所獨有，而且更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所廣泛擁有，在經濟制度上，是成熟的全民福利和公平競爭；在社會制度上，是人們各種形式的廣泛參與和共同管理；在政治制度上，是普遍的民主選舉和結社自由；在文化制度上，是思想、言論、教育的自由和平等。比較典型的是瑞典王國，這是個君主立憲國家，長期由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執政，也即該國沒有單一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權，但自稱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議會由普選產生，實行私營工商業與國營公共服務體系相結合的混合經濟制度和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實行九年一貫制義務免費教育。

相當一段時間來，大陸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推行教育、醫療的產業化，社會的貧困化局面不斷加深。但這恰恰是違背積極財政政策的本義。積極財政政策在美國始行於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新政，經濟學依據是凱恩斯 (John M. Keynes)，而凱恩斯經濟學的前提是「我們生存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故試圖通過一定程度的國家經濟政策和調控，以限制這種不公平，從而使社會發展「不需要革命」(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結語》)。實際上，凱恩斯經濟學就是在資本主義中注入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同樣是積極財政政策，羅斯福是為美國社會添加社會主義因素，而在中國社會則是減少社會主義因素，僅

僅成為了政府進行稅收增長、赤字、削減福利，以強化政府主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依據。可見，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因素可以獲得增加；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因素可能被削弱。實際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在經濟制度上注入社會主義社會因素，至少可以上溯到美國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當列寧還沒有認為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時，美國就已經開始限制壟斷、追求經濟競爭的公平原則了。正因為特別是二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因素的增加，追求建立單一社會主義性質政權的革命運動便在這些國家失去了基礎，就如凱恩斯所說的，「不需要革命」了。

以上可見，是否社會主義當然可以從國家形式、政權形式進行判斷，但更具體的則在於社會狀態和制度體系方面。在社會狀態和制度體系方面的經濟領域，是不是社會主義並不在於是否實行公有制，而在於是否建立全民福利和公平競爭的制度，以把人們的經濟生活納入到一個共同體系當中。所謂公有制落到實處，就是國家所有制，從企業制度說主要是國營企業，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1600年英國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就屬於西方世界第一家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了，而中國古代則有着更悠久的國有工場歷史，就更有着悠久的社會主義經濟傳統了，顯然，這是荒唐的。中國改革要深化，姓社姓資問題就無法繞開，只有拋棄教條，客觀站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演變實際上，深入認識社會主義範疇，才可以解開姓社姓資心結，才不會再發生因為對社會主義的不同理解而導致《物權法(草案)》擱置這樣的事件。